引　子

关于“中亚”这一地理概念在人们中的认识并不统一，本报告所说的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当前中亚政局走向主要取决于国际环境下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地缘文化因素的左右。新疆与中亚地区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无论从历史(主要是地缘文化角度看),还是从现实(主要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看）角度，今天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新疆稳定与发展，都难以排除来自中亚方面的影响。因此全面地、系统地、较深层次地考察中亚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潘志平

第一章　中亚民族的历史进程

本报告的重点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在讨论现实问题之前，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亚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做一简要概括，即：一、频繁的民族迁徙；二、多元的民族融合；三、激烈的民族冲突；四、民族进程相对滞后。

第一节　频繁的民族迁徙

史前中亚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苏联考古学家在土库曼斯坦西南、塔吉克斯坦中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地挖掘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那里发现的石器、禽兽骨头和烤火堆遗迹，表明其主要谋生方式是狩猎和采集。南土库曼斯坦的哲通文化可能是中亚地区最早期的农业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属于公元前第七千纪末到公元前第六千纪。关于中亚，学者有句名言："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中亚'地区的普遍特征。"[①]其实整个欧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的明

①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8页。

显特征是北部自蒙古草原至南俄草原绵绵不绝数万里，南部则是农业区。在中亚，北部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向东通过阿尔泰草原联接蒙古草原，向西与南俄草原毗邻；南部则是戈壁、沙漠和其中星星点点的绿洲农耕区，锡尔河、咸海一线大体是它们的分界。草原游牧人、骑马民族始终在游牧中运动着，从一块草地到另一块草地，同时不时地一股股地南下到农业区，与农耕的土著民融合中定居下来。从这点看，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

考古和人类学家认为，中亚最早的居民是古欧罗巴人。上两个世纪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雅利安人起源于奥克苏斯河(阿姆河)和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草原。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雅利安人的故乡在欧亚草原，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瓦解迁徙，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入伊朗高原，大约还有一支迁到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一带。也就是说，青铜时代有一部分雅利安人部落在迁徙过程中进入中亚并定居下来，这些部落一方面构成上古中亚民族的主要成分，另一方面把印欧语言传到更遥远的地区：伊朗东部、阿富汗和印度。南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和花刺子模的塔扎巴格雅布文化都能提供这种迁徙的证据。古文献中记录到的中亚居民是塞人，即刻于公元前521年的古波斯贝希登铭文中的Saka人。古希腊史家说："波斯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西徐亚人)都称为Saka人。"然而斯基泰人在古希腊文献中似乎是对黑海以北南俄草原上早期游牧人的泛称。这表明，Saka人和斯基泰人在种族上可能有相同之处。关于塞人的历史极为模糊。现有学者考证说：公元前7世纪末，塞人Asii部已出现在伊犁河、

楚河流域，稍后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当地的土著Massagetae人,此后他们被波斯人称为Saka①.

历史上向中亚迁徙的浪潮起初来自西方，如前所述，公元前两千纪中期的雅利安人是从西北方面过来的；而公元前一千纪中晚期，先后有波斯阿契美尼德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朝、安息朝对中亚南缘的入侵、殖民活动，则是由西南方面的侵扰。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由北南下中亚的。

月氏　早年居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2世纪受匈奴所迫,西徙伊犁、楚河流域,再受当时游牧天山北麓的宿敌乌孙挤压,南下阿姆河,征服了希腊殖民地——大夏国。

乌孙　与月氏同居祁连山北麓，先被月氏所破而西徙天山北麓,后挤走迁来的月氏称雄于伊犁、纳伦河畔,为西域一大国。公元5世纪受到崛起的柔然侵扰再南迁帕米尔高原。

呔哒　起于塞北，公元4世纪后半叶越过阿尔泰山转而南下中亚。公元5世纪初渡阿姆河自波斯进犯，后又向印度和塔里木盆地方向扩张，曾建过一强大的呔哒国。

突厥　狭义指建突厥汗国的突厥部，广义指古代欧亚草原上操着突厥语的游牧民——“突厥人”。突厥部公元6世纪初兴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初属柔然。6世纪中期灭柔然、呔哒，建突厥汗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至里海，南抵阿姆河。突厥汗国不久便分裂、衰亡，但草原上的“突厥人”自此不断南下中亚，逐渐定居，并致使中亚绿洲上开

①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绪说》,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始通行突厥语，即突厥化——这是中亚文化史上最深刻的变化。

乌古思（突厥蛮）早年生活在蒙古高原，与当时的回纥有复杂的关系，后来迁往里海以东的草原。它没有可汗，也极不统一，其中的个别部分广泛出征，其一支在今伊朗、土库曼斯坦的呼罗珊地区建立起塞尔柱克帝国，而后又在中亚细亚建奥斯曼帝国。它滞留在土库曼斯坦的后裔——突厥蛮人，即今土库曼人的先民。

契丹　我国北方古代民族，建立过辽王朝。在辽王朝覆亡之时，契丹显贵耶律大石率一部西走，转战数万里，大败塞尔柱克帝国，降高昌回鹘国、喀喇汗国、花剌子模国，在中亚建立起西辽王朝，它们又被称作哈拉契丹人。

蒙古　12世纪之前，蒙古只是贝加尔湖东南的一个很小部落的称呼。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东征西讨，建立起纵横数万里，占有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中亚地区是蒙古最早征服的地区之一。在大蒙古帝国分裂后，中亚以巴尔喀什湖、咸海为界，其北草原地带为钦察汗国领地，其南为察合台汗国的领地。来到中亚绿洲的蒙古人逐渐定居，且突厥化。后来称雄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就是突厥化的蒙古部所建。

月即别　在钦察汗国分裂后，哈萨克草原上的蒙古、突厥诸部落，被称作“游牧月即别人”。16世纪初月即别人的一支由草原南下，灭亡帖木儿帝国。这些来到绿洲的月即别人定居下来，与当地人融合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乌孜别克人，而滞留草原上的月即别人则逐渐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哈萨克人。

黠戛斯　其族源可追溯到汉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 丁昆、契骨。7世纪后，开始向天山山区发展。蒙古入侵后,又往帕米尔、费尔干纳、昆仑山区迁徙。直到17世纪俄国人东进西伯利亚，它的最后一批人——吉利吉思人才离开叶尼塞河故地南下到中亚天山山区。

在沙俄征服中亚之际，当地民族主要有两种基本成分：一是操突厥语的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构成中亚居民的大多数；一是操东伊朗语的塔吉克人,居住在中亚南缘的平原和山区。沙俄征服中亚后,这里又增加了一种基本民族成分，那就是来自欧洲的斯拉夫移民,主要是俄罗斯人,多居于城镇,社会地位较高。在大批操突厥语部族南下前，塔吉克是中亚的土著，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吉克古代史就是突厥化前的中亚古代史。但是，如前所述，塔吉克的先民追根溯源还是早在公元一千多年前由欧亚草原来的雅利安人。而中亚现代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继承了突厥、蒙古渊源外，也接纳融入了不同于突厥、蒙古的本地印欧语族的渊源。他们不简单地是古代原住民的后裔，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正如学者精辟之见："中亚现代的操突厥语各民族既是外来的,也是本地的。"[①]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 中亚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迁徙史，土著和非土著则是某一历史时代的相对概念而已。

①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第二节　　多元民族的融合

如前所述，古欧罗巴人是中亚地区最早的居民。亚利安人、塞人，甚至还可能有月氏人、乌孙人，都是印欧人种。古代历史上许多情况极其模糊，但是比较有把握的一点是，直至公元6世纪，中亚绿洲上的农民主要还是操印欧语言的。如果我们回顾中亚的历史，那么一位学者的论断是极富启迪意义的，那就是："中亚的畜牧业游牧民族，与亚洲边缘上高度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替表演，就成了亚洲历史的节奏。"[①]一些游牧部落，特别是蒙古高原上的部落，不断结成部落联盟，建立起一个个草原"行国"，在短时期内聚集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威胁过南方的农业区，即中国中原地区，但在遇到中原中央王朝强有力的阻遏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西南，扑向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总的来看，草原上的游牧"行国"骤然崛起，而又很快衰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绿洲中的城镇是某种较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吸收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和思想传播给邻近地区。比如在这些绿洲中至少发现过16种语言和24种文字书写的文书。绿洲是不断受到威胁的，因此它的居民生活的狭小天地，既是内部平静的封闭小世界，也是动荡不定的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永世流动"是游牧民的信念，但是"任何地方也

①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66页。

不要定居 ’既然是成吉思汗‘ 钦定 ’的法令,那末从反面证明，游牧民南下走向定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趋势，迁徙走向定居就意味着融合，这里最重要的标志是中亚突厥化。

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 突厥人 ”。学者举例说,黠戛斯人原先不是‘ 突厥人 ”,而后来被突厥化了。具体到中亚中世纪的突厥化,就是说游牧的‘ 突厥人 ’来到绿洲与当地的操东伊朗语居民通婚、混血,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实现至少有两个前提 :一是游牧的‘ 突厥人 ’改变原来的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二是‘ 突厥人 ’要改变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接受当地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与当地人杂居,方可便于通婚、融合 而且只有改信仰伊斯兰教,才可能够通婚、混血。一般而言,不同宗教信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何况穆斯林妇女尤其不能嫁给异教徒。因此,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大体是同步的,并且是相互促进的。

以上我们一再谈到中亚历史上民族迁徙所表现的 “ 南北关系 ”。事实上,人们可能更加熟悉中亚历史上文化传播所表现的‘ 东西关系 ”。众所周知,古代欧亚大陆上存在着一条联系的纽带——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它将古代人民东西友好往来概括得既形象又富于诗意。但这终究是个艺术化了的概念，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引起人们误解：以为丝绸之路仅指的古商道,甚至仅仅是贩运丝绸的贸易之路,其实,丝绸之路的内

涵在于它所体现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其中最瞩目的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宗教文化。源于古代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和源于印度的佛教，都是通过中亚这个丝绸之路的枢纽向东传播的。其中有三个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一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特别能兼容并蓄，在公元前后的近千年时期在中亚产生最深刻的影响；二是佛教传播时通过中亚南缘的希腊人的大夏国，发展成一种希腊佛教（也有罗马因素）的艺术，这个艺术之光还照亮了更远处的中亚；三是祆教、摩尼教,还有部族的原始宗教在中亚并存,和平共处,其间也有可能在这几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宗教之间，出现奇特的结合，例如在佛教寺庙中设置祆教拜火祭坛，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中亚迅速伊斯兰化,其他宗教虽未完全绝迹，但伊斯兰教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宗教的地位却是越来越牢固。

伊斯兰教文化进入中亚是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中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宝剑’和免纳人头税的硬软功夫下,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总不免把一些传统的思想带进伊斯兰，形成有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有着佛教、摩尼教的明显影响，依禅的活动有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什叶派的观点具有摩尼教灵感论和古伊朗其他宗教思想的烙印，摩尼教艺术很明显地继续存在于伊斯兰细密画之中，伊斯兰清真寺的建筑有借鉴佛教寺院的东西。伊斯兰在中亚本土化，使自己在中亚完全扎下根来，同时它又因此丰富多彩。中亚特

色的伊斯兰教不仅意味着多元民族的融合，而且也体现了中亚多元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节　激烈的民族冲突

从审视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多元民族的融合，多元文化的整合，应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民族冲突而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当我们翻检那个时代的史书，那些为汗王、艾米尔歌功颂德的“武功记”，历历在目的是刀光剑影、生灵涂炭和赤地千里，一幅幅恐怖、血腥的图景。

屠城　13世纪蒙古入侵，整个中亚沉浸在血火之中。蒙古大军每下一城，便屠一城，在讹答剌、昔格纳黑、乌支根、养吉干、毡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忽毡、花剌子模、帖尔美兹、巴耳黑、兀笼格赫、梅而甫，城被毁、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被杀。这种惨绝人寰的屠城剧在中亚史上是一演再演。比如，1512年波斯“红头军”（克孜尔巴什）攻占卡尔希后屠杀了城里的所有居民，儿童、老人、妇女也不得幸免。当时还有一些被尊崇为“圣裔”（穆罕默德后裔）的赛义德们躲藏在清真寺内。可指挥什叶派红头军的巴布尔汗发令：“当圣战的勇士用武力占领任何一个地方时，都要把这个地方的居民斩草除根。这样做时是不分什么赛义德不赛义德的。”于是红头军的兵士们冲进清真寺，把赛义德们的头一个一个割了下来[①]。

①艾哈迈多夫：《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塔什干，1985年，第4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头塔　这大概是帖木儿大帝发明的令人发指的暴行。1387年攻占伊斯法罕时，他命令麾下军士将7万名和平居民斩首，把他们的头颅堆积成金字塔。　1401年在镇压巴格达人民反抗后，在过古尔邦节的那天，他命令军士斩9万人首级,用人的头颅砌了120座金字塔。史书记载，在辽阔的帖木儿帝国中有无数这样的人头塔①。人头塔对于被征服者有极度的震慑力，故此自帖木儿以后，堆砌此塔之风在中亚蔓延。1757年布哈拉艾米尔穆罕默德·拉希姆在远伐吉萨尔时，把俘虏全部砍头，堆成一座巨大的人头塔。时过200年后苏联学者调查发现，关于这座人头塔的恐怖图景仍遗存在当地居民记忆之中②。

“麦子”的故事　这是费尔干纳盆地流传的故事。一二百年前居住在平原的定居民萨尔特人与居住在山上的吉尔吉斯牧民以及山前地带的半农半牧的克普恰克人之间一直在残酷的厮杀。两个不相识的人相遇,就说一句‘麦子”。萨尔特人麦子的发音‘布格达依”,吉尔吉斯人、克普恰克人麦子的发音是‘布依达依”。如果两人说得一样,那末就是友好的同族人,相安无事 如果说得不一样,那就拔出宝剑,厮杀个你死我活③。

上述故事提到的萨尔特人大体指的是当时平原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可以说，中亚民族进程本质上是游牧民和定居民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不断再分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萨尔特人这一概念的演变。萨尔特源于梵文

①伊万诺夫：《中亚史纲》,莫斯科，1958年,第 101页。
②同上。
③库尔班外力·哈力德：《东方全史》,喀山，1908年,第91~92页。

Sarataraho ,原义是商人,后演变为定居民。穆斯林文化的代表人物首先以商人身份来到北方草原，蒙古人由此将他们那里定居的穆斯林称作萨尔特人。游牧的‘突厥人’跟着蒙古人把塔吉克人称作萨尔特人。萨尔特在这里和“突厥人”相对,以区别定居民和游牧民。当然‘突厥人’还有统治定居民的意思,因此那些后来过上定居生活的‘突厥人’不愿以萨尔特人自称。16世纪月即别人的一部分南下，在他们看来‘突厥人’和塔吉克人都是自己统治的定居民,都是萨尔特人。南下这支月即别人也很快定居，与当地的“突厥人”融合成乌孜别克人，于是又被那些留在草原的月即别人(即后来的哈萨克人)看成同塔吉克人一样,都是萨尔特人。总之萨尔特定居民的内涵不变,而其外延却随着民族迁徙、融合的过程不断发生变化，在中亚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谁定居，谁就是萨尔特人①。萨尔特人与游牧民的斗争如“麦子”的故事表现为极其残酷的流血斗争,但本质上不是宗教或政治上的对立，而是处于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的人们面对愈来愈窘迫的水和土地资源的忧虑所致。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都面临着中亚的较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制约。一批批游牧民到来，并由游牧转向农业和定居的过程不断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定居的游牧人与本地的定居民之间争夺水和土地的斗争。透过“麦子”的故事,可以看到这种民族冲突的本质之所在。宗教斗争也是如此,透过上述什叶派的红头军肆意杀戮‘圣裔’赛义德的悲惨事件中,可以看到‘圣战’和宗教斗争的本质。

①巴托尔德:《再论‘萨尔特’一词》,《民族译丛》,1989年第4期。

第四节　　民族进程相对滞后

至19世纪下半叶沙俄征服者来到此地，中亚的民族过程明显地落后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方。中亚的居民虽然已存在民族差别，但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和科学地界定为各个不同的民族，这集中体现在民族称谓上的极其混乱。比如20世纪初喀山出版的中亚当地史籍《东方全史》,谈到费尔干纳时主要提到的是萨尔特人、克普恰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俄国民族学者在论述乌孜别克历史进程时讲到：在苏维埃最初年代，“出现的氏族部落联盟，还没有确定的族名。用‘库拉玛’称那些已接受乌孜别克的经济成分,但仍操哈萨克语的人，用萨尔特称城市中的乌孜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关于萨尔特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克普恰克人也是从中亚的北方迁来的游牧民的后代，生活在中亚的山前地带,半农半牧,直到十月革命时期,它保持着自己的氏族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从民族人口统计里消失,大约分别融于乌孜别克、吉尔吉斯之中。19世纪哈萨克中除大、中、小三大玉兹外，还有一个多氏族的混合部落——库拉玛。库拉玛,其义大约是‘混合成分”,如果说难听点,就是‘杂种”。后来这个库拉玛大部融于乌孜别克。

总之，直到十月革命时期，中亚诸民族的分解和融合还在生动地进行着，各民族间的界线还不能说十分清晰，当时哈萨克人被误叫做吉尔吉斯人，而吉尔吉斯人被称作卡拉吉尔吉斯人，这个错误直到1925年才被纠正过来。再比如,1921年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这样罗列中亚的非俄罗

斯人：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土库曼）、塔吉克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布哈拉、希瓦是16世纪以来中亚乌孜别克人建立起的汗国，布哈拉人、希瓦人是汗国国民之称谓，不是民族集团的名称。当时中亚民族称谓之混乱表明，中亚民族历史发展离开现代民族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

在沙俄统治下，中亚各族人民深受民族压迫，社会经济生活十分落后。中亚一部古文书曾记录绿洲上农民的生活：

> 农夫……额头上满是汗水，他们的手掌肿胀粗糙，脚掌也裂了口子，他们的血液冻住了，他们干渴，饥肠辘辘。他们在坎坷不平的田野上走来走去，手扶犁，弯着腰，忧愁使他们日益消瘦。他们播种，用尖嘴锄刨地。他们衰弱了，他们辛苦地干活，不能坐下歇一下。他们把种子撒到地里，及时地覆盖上泥土，他们饱受艰辛，直到通过渠道把土地浇灌完为止。

这是1 000多年前的情况，1000 年 后 的20世纪初依然如故。中亚北部草原上牧民的生活同一两千年前的情况别无二致。中亚的社会经济生活停滞了，特别是中世纪海路交通兴起后，中亚显得更加封闭、落后。中亚民族过程的滞后，正是这种社会的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决定。

19世纪下半叶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它同古代历史上大多数征服者一样，都是从北方进入中亚的，但是它绝不同于那些古代的征服者。

它不是传统的民族或种族迁徙，而是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如恩格斯指出的“俄

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①]正是这种征服，中亚经济、文化纳入俄罗斯经济文化圈，中亚由此步入近代史。

沙俄对中亚的统治本质上是殖民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中亚各族人民深受民族压迫，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被同化，反抗情绪与日俱增。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沙俄当局加紧对中亚各族人民的压榨，使之处境更加悲惨。1916年，终于由沙俄在中亚征兵为导火索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中亚人民大起义，起义烈火燃遍中亚大地。沙俄出动重兵镇压，还未扑灭起义烈火，自己便在十月革命的风暴中灭亡。但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对抗，则是留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遗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0页。

潘志平

第二章　苏共的民族政策与苏联时期中亚民族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亚民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产生的问题，都与苏维埃时期苏共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有着根本联系。本章着重讨论如下四个问题：一、列宁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路；二、苏联民族政策的实施；三、中亚苏维埃时期民族关系的轨迹；四、宗教自由与“反宗教”宣传。

第一节　列宁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路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沙俄专制斗争的最初时期就已认识到，俄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族殖民地问题，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砸烂沙俄这个“民族牢狱”，解决这个民族殖民地问题。其思路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

列宁认为：“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